

弗朗西斯·伯顿视野中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石云龙

摘 要:英国探险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爵士以“天生的”穆斯林身份去麦加、麦地那朝觐后,写下了世界名著《走向圣城》,记载了他对东方圣地的考察、对东方知识、理论、制度、实物的描述,以及对东方经验、风俗、观念、生活方式等的研究。尤其是他向读者所展示的东方穆斯林圣地,渗透了他对圣地的西式理解,进而凸显出鲜明的本体文化理念。

关键词:伊斯兰教; 圣城风情; 帝国学者; 伯顿爵士

作者简介:石云龙, 硕士,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江苏南京 210016)。

文章编号:1673-5161(2007)02-0076-05

中图分类号:G371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属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西方权力话语中的伊斯兰文化研究”(05SJD751005)的前期成果。

一、穆斯林圣地与探险家伯顿

亚洲西南部有世界上最大的半岛,阿拉伯人称之为阿拉伯半岛,波斯人和突厥人则称之为“阿拉伯斯坦”^{[1]3}。它西滨红海、南临阿拉伯海,东濒波斯湾和阿曼湾,北邻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半岛历史悠久,既催生了古老的阿拉伯文明,又成为伊斯兰教的发祥地。早在7000余年前,阿拉伯民族的祖先闪米特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该地的麦加和麦地那两城,在伊斯兰教徒心中享有神圣地位,被尊为当今世界10多亿穆斯林——伊斯兰教信奉者^{[2]1491}的圣地。

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先知,约于公元570年出生在麦加城古莱什部落的哈希姆家族。七世纪初,穆罕默德在希拉山间默祷时得到真主的启示^{[3]15-20},创立了伊斯兰教,信奉安拉为惟一之神,反对多神信仰和崇拜偶像,于612年开始在世俗性较强的麦加城传播伊斯兰信仰。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的传教活动遭到麦加贵族的迫害,后被迫转移到麦地那,史称“迁徙”^{[4]56}。630年,穆罕默德率兵大举进军麦加,迫使麦加贵族首领俯首称臣,承认穆罕默德的先知地位,皈依伊斯兰教。这就为阿拉伯半岛的统一与伊斯兰教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麦地那是伊斯兰教第二大圣城,意为“先知之城”,旧称雅斯里布。622年穆罕默德迁徙于此后更名,并在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时代^{[5]28}成为伊斯兰教政治中心,在伊斯兰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曾被穆斯林们冠以“被照亮之城”、“和平之城”、“胜利之城”^{[6]195}等名。穆罕默德归真后,就安息在他亲自督建的先知清真寺内,而他的继承者——哈里发则承担起伊斯兰教的宣教重任,并从麦地那城开始了对波斯等地的远征,使波斯、印度相继由佛教之国变为“清真之国”。

朝觐圣城是每个穆斯林一生梦寐以求的宿愿。因为圣城的迥然不同的地域特征、神秘莫测的宗教

氛围、与众不同的建筑风格、独特奇异的生活习俗和虔诚无比的伊斯兰教仪式，无不令非穆斯林好奇并神往。英国著名探险家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爵士（Sir Richard Francis Burton, 1821~1890）就是较早走向穆斯林圣城的欧洲人之一。

伯顿并不是第一个去圣城朝觐的非穆斯林欧洲人，早在3个多世纪前，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作家路德维克·德·巴塔玛（Ludovico di Barthema）就于1503年4月首开先河，从大马士革出发去麦加和麦地那朝觐^[7]，然而，在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却是伯顿的朝觐。有资料显示，伯顿的这次朝觐旅行具有厚实的基础：20岁前因随家庭不断在法国、意大利和英国之间迁居而能流利地说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等4种语言和两种方言，后来又学会了包括阿拉伯语、兴都斯坦语、古吉拉特语、马哈提语、波斯语、木尔坦语、达罗毗荼诸语、泰卢固语、托达语、梵语、土耳其语、普什图语和亚美尼亚语在内的25种语言和15种方言。自1842年违反校规被牛津大学开除而进入东印度公司以后，在印度8年的生活经历以及对东方世界的兴趣使他对当地习俗和传统有了充分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在担任下级军官时，他曾经常乔装成穆斯林在东方世界旅行并多次被人误作虔诚的当地教徒。从此，他就萌生了赴圣城朝觐的念头，并通过悉心研究和大胆实践作了大量细致周到的准备工作（包括行割礼以减少被人发现的危险）。他对东方有着渊博的知识，对复杂的伊斯兰教礼仪了然于心，对东方习俗的细枝末节了如指掌。1853年伯顿动身前往开罗，随即采用不同的伪装策略，进入圣城麦加与麦地那。伯顿历经千难万险回国后，根据自己在圣地的亲身经历，创作了两卷本、长达近千页的鸿篇巨制《走向圣城》（*Personal Narrative of a Pilgrimage to Al-Madinah and Meccah*, 1855~1856），向西方读者较为客观真实、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古老而神秘东方的风物人情。此书在欧洲出版后，引发了西方读者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对揭开古老东方世界的神秘面纱、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走向圣城》因此成为西方世界认识东方、认识穆斯林圣地的经典名著。

二、异域圣城风情

伯顿“走向圣城”的线路始于亚历山大城，经开罗到苏伊士，假道西奈半岛进入今沙特境内，又沿红海边的希贾兹进入穆斯林第二圣城麦地那，后经苏韦尔吉亚到达圣城麦加。伯顿沿途亲眼见到了迥异于欧洲大陆的东方风情。当他乘船航行在尼罗河上，便开始感受到了沙漠地区的独特景致：“觉得一股轻风拂面而来，然而此风热哄哄仿佛来自陶工的炉膛”^{[8]30}。“河岸上狭长土地那边，是闪烁着黄色光芒的沙漠，那里有一道道低矮山丘、一道道沙梁，与其毗邻的是大自然这个建筑师巧夺天工的无数金字塔。”^{[8]31}来到城镇，“扬起沙漠上细沙和火炉一般热浪的大风刮遍整个城镇，大地则以更多的热浪来回应上空袭来的阵阵热气，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甚至连一丝雾气也不见，沉闷一片，蔚为壮观”^{[8]78}。寥寥数语，便再现了当地气候之炎热以及生存条件之恶劣。途中所见的建筑物也十分独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当属清真寺，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伯顿首先交待了穆罕默德在麦地那附近建造的库巴清真寺正方形寺院的由来，并经考证后认为，圆屋顶、壁龛和尖塔出现在瓦利德（*Walid ibn Yazid*, 约707~744）统治时代^{[9]157}，后成为穆斯林世界的典型建筑之一。麦加清真寺已成为伊斯兰世界清真寺建筑的楷模。他细心地发现，位于耶路撒冷的奥马尔清真寺、尼罗河上巴比伦城的阿姆鲁清真寺以及开罗的土伦清真寺在建造时作了细微改变，如在神圣建筑克尔白的图样上加了拱形回廊、内接檐等。伯顿还注意到，清真寺建筑平面图流传到各国时，也因各地审美取向不同而出现了种种变化：在西班牙清真寺趋于奢华，土耳其的变得异常艳丽，叙利亚的则坚固耐用，印度清真寺显得纤细而精致。当然，伯顿见到许多清真寺，有些是雄伟的高大建筑，有些则是倾圮的露天小棚；许多建筑光鲜依旧、保持着昔日的风采，更多建筑则风光不再、呈现衰落景象。他还详尽描

写了阿扎尔清真寺和哈桑因清真寺：“那里有一个露天庭院，充满了阳刚之美，一条通道可能堪与泰坦神殿相匹配，还有一座气势磅礴、宏伟壮观的尖塔”^{[8]98}。这座大约建成于公元1363年、外带堡垒的清真寺“和凯德贝伊及其他马穆鲁克国王的坟墓因为高贵的美与脱俗的品味而受到人们的尊敬。即便在其现存状态下，如画美景也压倒了腐朽衰败景象。褪色玻璃上的充足光线透过傍晚刚开始的阴影泻到大理石地面上……其震撼人心的感受无可比拟”^{[8]99}。

同时，伯顿还以写实的笔调客观描述了朝觐途中的各种遭遇。他曾在炎热的沙漠地带昼伏夜行艰难向前，“黑夜像落幕一样向我们袭来。骆驼走得磕磕绊绊，驮轿随之摇摆颠簸，就像浮在浅海中的小艇一样，天篷好几次都差点从驼背上脱落下来。”^{[8]132}也曾在于河谷中狭窄的道路上遭受过身手矫健的巴达维人的伏击，“大量的巴达维人恍若大黄蜂一样蜂拥在山顶上，……攀爬起山来就像山猫一样灵活。他们在要害地点占据有利地势后，开始非常便利地向我们开起枪来。”^{[8]273}在怪石嶙峋的群山上经受磨难是家常便饭，在暑气逼人的西蒙风中赶路已成自然。但在东方神奇的土地上、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朝觐者的“呼吸轻松、视觉清晰、记忆恢复了常态，精力变得十分旺盛，想象与幻想力被充分调动起来。”恶劣的环境能够“激发起灵魂中所有活力来直面危险。精神状态得以改善，人们变得率直而真诚，热情好客且全心全意，虚情假意的客套和文明的束缚都被你统统丢到了身后的都市里。”^{[8]150}在这里，自然条件的恶劣与欧洲的文明社会形成了鲜明对照，伯顿理智的天平倾向了荒凉、壮观的大自然。而且，在他看来，虽然物质匮乏、生活清贫，沿途穆斯林的生活境遇艰难。但人们的精神生活却十分富足，已把个人安逸、世俗享乐，财帛收获等置之度外。他还坦言，自己曾得到很多善良穆斯林的关照。结果，他发现当时的东方人还处于愚昧落后的状态，行为方式还未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给人以野蛮甚至无理的印象。但他发现了东方人的纯真、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品质，他们已不再重视外表虚荣、出身贵贱、种族优劣、个人成就以及社会地位等。这就是圣地的人们，就是渴望成为或已成为哈吉^{[10]1183}的人！

伯顿在《走向圣城》中，不仅详实地描写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和亲身经历的事件，向读者展示了充满东方伊斯兰教氛围的环境以及奇特诱人的东方习俗，还清楚地介绍了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尤其较详尽地介绍了逊尼派教法四大主要派别——沙斐仪教派、马立克教派、哈纳菲教派、罕百里教派，并较客观地展示了所见到的伊斯兰教的各种仪式。

三、帝国学者的视角

伯顿身处欧洲人疯狂掠夺世界财富的时代，一生中多次冒险，为大英帝国在东方世界、非洲大陆勘探自然资源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也为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

虽然他否认东方圣城之行的任何政治目的，声称自己“彻底厌倦了‘进步’和‘文明’，渴望亲眼见到别人满足于‘用耳朵听’的东西，即真正伊斯兰教国家内部的穆斯林生活。”渴望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那块神秘的土地，因为那是“度假旅行者从没有描述过、从没有测量过，也从没有拍过照片的一片土地啊！”^{[8]17}是为了“消除现代冒险事业中那个不光彩的纪录，消除我们地图上阿拉伯半岛东部和中部地区那个巨大的空白点”^{[8]xxi}。但不可否认，这种精心策划的圣地之行与大英帝国的根本利益保持高度的一致，他的计划博得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赞许和资助，他的冒险赢得了英国人的普遍尊敬与认可，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上述论点。尤其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乔装成“天生的”穆斯林进入圣地，更说明其朝觐目的并非出于伊斯兰教信仰，而是出于坚定的帝国学者立场：他是为了“消除空白”而在履行自己作为大英帝国子民的义务，是在为了效忠大英帝国而作出自我牺牲。

尽管他对当地语言的精通和习俗的谙熟很好地掩饰了乔装的身份，但是，他那与生俱来、渗透在

骨子里的大英帝国子民的高傲却无法掩饰到不露痕迹的地步，而且会在无意识中自然流露，他曾为捍卫尊严与一个阿尔巴尼亚非正规军士兵摔跤，在征服了对方使膨胀的自我得到充分满足后，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的“本我”和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中“种族的记忆”开始显现，结果竟然与被自己征服的对象勾结起来，恶作剧般地试图逼迫虔诚的穆斯林哈吉犯禁饮酒，导致自己失去“严谨的人”的名誉后灰溜溜地狼狈离开。也正是作为英国人所独有的优越心态——征服世界而傲视一切的心态，使他在与马格里布人争夺船上地位时，曾暗中使坏地将堆放的盛水陶罐当作武器，向处于群体打斗状态的对方推过去，使后者头破血流而俯首称臣。

伯顿拥有大家族出身的背景、童年在英、法、意迁居的经历，以及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的资历等。因此，纯欧洲背景和所受教育与影响，使其在潜意识中带上大英帝国臣民固有的高傲和优越，这又渗透在他的观察、描述与评论的方方面面。因此，斯坦利·莱恩—普尔曾经这样评论，“本书以伯顿的那种感情用事的冲动方式匆匆完成，它内涵丰富、森罗万象，令人不可思议：其中不仅包含作者敏锐的观察、广博的东方知识、冷嘲热讽式的幽默，还有作者用充满活力的方言表达出的形形色色的信念。”^{[8]4}在描述自己的东方经历和比较东西方差异时，就会不知不觉地带有明显的帝国学者的倾向，大英帝国子民的立场一览无余。如在设法使自己签过证的护照得到地方治安警官反签的过程中，他的描述详细而生动，不仅以幽默的笔触再现了东方官员的官僚习气和拖沓的办事效率，而且还展示了他如何利用贿赂、恫吓和纠缠来达到目的的经历。当他洋洋自得地在向人们炫耀他的所谓对付亚洲官员的三种方式时，当人们读到他那些略带轻蔑的口吻详尽叙述的经历时，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生动的图景：一个目空一切、睥睨众生的欧洲人在自以为是地夸夸其谈。

伯顿在与当地各民族及外来穆斯林交往过程中，不仅深入了解了穆斯林的生活习性和朝觐习俗，而且还熟悉了他们的待人之道。出于某种原因，他在向西方人描述伊斯兰教与穆斯林时，没有、似乎也并不敢对伊斯兰教表现出任何不恭，但他对当地人的生存状态、生活习性的描述，却在貌似客观真实的幌子下，下意识地流露出了不屑，较为充分地表现出帝国殖民者的优越感。如在描写当地人时评论道：“男人们互相诅咒并且殴打女人。女人则打骂孩子，而轮到孩子时，他们就残忍地虐待猫狗，用恶毒的语言咒骂它们……清真寺里充满了庄严肃穆、嘴里念念有词的人，他们在为自己上天堂铺路，然而却在俗世上相互冒犯。”^{[8]75}

他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厌倦了西方文明生活，但是，即便在描写阿拉伯人的生活情趣时，也会采用一种傲睨万物的口吻，强调欧洲人的生活富有活力、紧张强烈、充满激情，而东方人的生活中只有休息和纳凉。“在潺潺流动的河岸边，在芬芳扑鼻的清凉树荫下，人们抽一袋烟、呷一杯咖啡或饮一杯冰冻果子露，感到幸福无比”。在他看来，这是“动物生活的趣味，纯粹感官的被动享受，舒适惬意的倦怠，梦一般的宁静，海市蜃楼般的虚幻。”^{[8]9}

总之，从作者阐述的亲历事件中，从充满幽默机智的话语里，人们极易发现，在殖民帝国主义时代，一个西方人看待古老东方文明的独特视角、一个所谓厌倦了西方“文明”的英国人对待东方文化的傲慢立场，一个强势话语权者叙述东方风情时的霸权态度。

四、结语

人类文明发展史实为一部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交流的历史。在不同文化交汇、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基于物质优势的文化的主动进入与渗透，还是处于相对物质劣势的文化的接受或回应，文化间相互的浸染与影响都是难以避免的，而一种文化的借鉴和吸收又多发生在根据自身的文化语境加以筛选后以“变形的”形式出现。

作为大英帝国文化的代表,从对东方文明的认识、对东方圣地的考察、对东方知识、理论、制度、实物的描述,以及对东方经验、感知、风俗、观念、生活方式等的研究,必然会与其本体文化理念相比照联系。他向读者展示的东方穆斯林圣地,必然发生在他对圣地的西式理解之后。因此,悉心研读《走向圣城》,研究作者的亲历亲为及其心路历程,可以发见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变化和差异,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个体心态和理论语境,从而了解文化间的异同,认识东方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东方文明的辉煌与衰落,认识强势文化或霸权文化的实质,进一步发现东方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揭示东方文化在西方的深远影响,为文化哲学多元论提供更多佐证。

对于西方人来说,《走向圣城》确实是一部百科全书,一部适合他们了解东方、了解朝圣的百科全书。当然,对于东方读者来说,《走向圣城》提供了一个了解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文化的窗口。因此,《走向圣城》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认识东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窗口。

[参考文献]

- [1] 昂里·马塞. 伊斯兰教简史[M]. 王怀德,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 [2] Philip Babcock. Webster's Third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M]. Merriam-Webster INC., Publishers,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Beijing, China: 1986.
- [3] 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 先知的土地·伊斯兰世界[M]. 周尚意, 等, 译.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
- [4] 金宜久. 伊斯兰教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5] 李惠彬. 伊斯兰文明[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6] 郑勉之. 伊斯兰教简明辞典[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 [7] Ludovico di Varthema: Encyclopedia[EB/OL]. http://en.wikipedia.org/wiki/Ludovico_di_Varthema.
- [8] Richard F. Burton.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Pilgrimage to Al-Madinah and Meccah[M]. Bell and Son, 1924.
- [9] Isabel Burton. Life of Sir R. F. Burton[M]. Adamant Media Corporation, 2001.
- [10] W.R. Trumble.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M]. Oxford Univ. Press, 2004.

Arab-Islamic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ancis Burdon

SHI Yunlong

Abstract Sir Richard Francis Burton, an English explorer, linguist and anthropologist, wrote the world famous work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Pilgrimage to Al-Madinah and Meccah" after his pilgrim as an "inborn" Muslim, recording his observation of the holy land in the east, his description of the Eastern knowledge, theory, system and objects, and his study of the Eastern experience, perception, customs, manners and ways of life. His observation and study are filled with his ontological cultural ideas, and his demonstration of the Eastern Muslim holy land must occur after his western digestion of the holy land.

Key Words Islam; Civilization of Holy Cities; Imperialist Scholar, Sir Burdon

(责任编辑: 李 意)